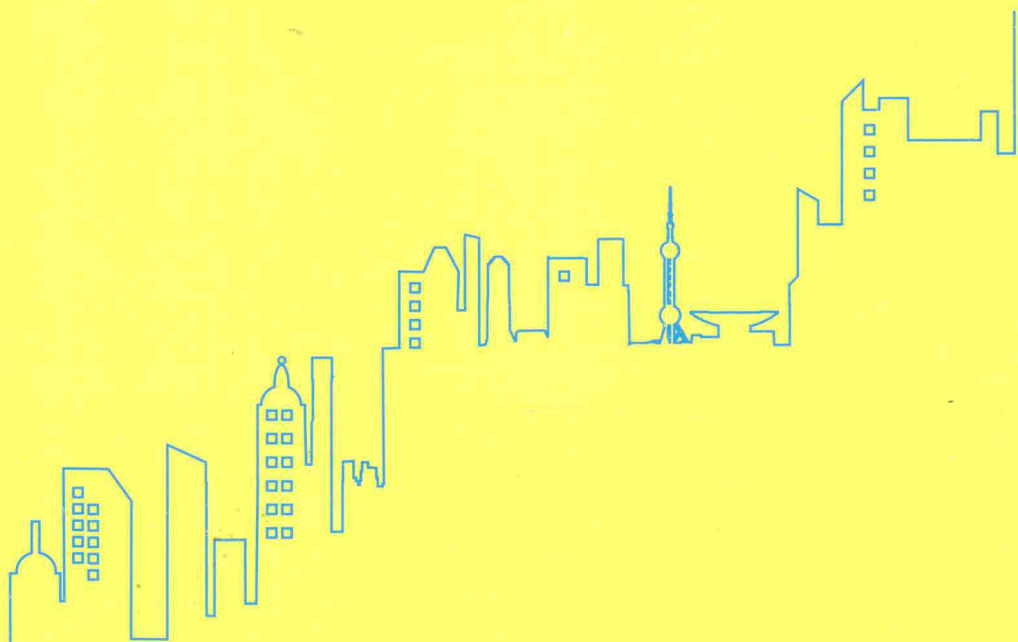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5000 Years

城镇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徐斌◎著



五千年来第一次，伟大的农耕民族正在凤凰涅槃
在这场亘古未有的城镇化大转折中

三十年来制度红利殆尽，新制度红利何处寻觅？

老龄化社会迫在眉睫，全球央行开闸放水，中国经济如何应对？

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城镇化——红利究竟有多大？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五千年未有之 大变局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5000 Years**

城镇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徐斌◎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城镇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徐斌著.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136-2969-0

I. ①五… II. ①徐… III. ①城市化—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IV. ①F299.21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903 号

责任编辑 余静宜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久品轩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136-2969-0/F·9972

定 价 3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68359418 010-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12390)

服务热线:010-68344225 88386794

序 言

两千多年前的未央宫中，一代名将韩信被一群妇人用竹竿捅死的时候，可能压根没有想到以“异性王”为标志的封建制度已经在逐步瓦解中，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从先秦的封建制过渡到郡县制这一变化，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解读，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千年一变”。这一变化，持续了二百多年才告终。从典籍上看，当时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这一历史巨变。二百年，太长了，用几代人的生命周期完成的历史烙印，一个普通人用他短暂的一生，是感受不到的。

将历史视频播放器快进到19世纪末期，全球化的冲击，使当时的人们敏锐感受到：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墨西哥、葡萄牙、德意志等闻所未闻的国度和民族，席卷着船坚炮利、廉价商品呼啸而来。李鸿章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场变局，可不是剪掉头上小辫子那么简单，也不是赶走皇帝，将故宫变成博物馆那么随便了事。它从心理上再塑了汉民族：从“君君臣臣”、“中央之国”、“万邦来朝”，到民主共和、联邦分权制衡，再到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其人心、思潮跨度之大、之深、之剧，确实三千年之未有。

无论是秦汉前后的“千年之变”，还是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人心、思潮的变动，随之而来

的是典章制度、器具文明之变化，但无论怎么变，都不影响其生产生活的变化。县太爷归皇帝老子管，还是归王爷管，对于田间地头的农民而言，只不过是换个主子而已，他终归是要种田有收成，才能有饭吃。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而言，洋人、洋布、洋灯火等诸多人物、器具固然大开眼界，也方便生产生活，但他们的生活，终究还得落在田间地头中。一句话，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无论怎么变，其生活重心落在农耕生产方式的“天”不变，依附其上的各类“道”，其实也不会大变。

但在1998年，中华民族的“天”变了。

那一年，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28%。通过国际城镇化经验对比，这一比例正好是城镇化进程的临界点，一旦突破，城镇化进程将进入加速阶段，一般会在80%左右止步，个别甚至在90%以上。在2012年，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高达51%，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和国际经验吻合，如果趋势持续，那就意味着在未来十多年里，中国人中的八成居民都要告别农村，到城镇中靠务工经商为生。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变化，可谓“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天变，道亦变。

1998年，无论是蓬头垢面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还是在象牙塔里讲经布道的教授学者们，或者高踞庙堂之上的衮衮诸公，都未意识到他们正身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而到了2012年，这一变化惊天动地，差不多所有人都意识到了，甚至中央政府将城镇化进程列入正式工作日程之中。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生活生产方式如此的剧变，所引发的社会心理、人群组织方式以及经济周期等诸多影响和冲击，很少会有人意识的到。所谓“鱼在水中而不觉察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天变，但现在少有人察觉道亦变。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能为处于这个剧烈变迁的大时代而感到庆幸。不是每一代中国人，都有这样的好运气，能遭遇到如此剧烈变迁的时代，并且能在一代人的生命中感受到。对于这个时代变迁带来的诸多变化，我有自己独特的思考，这里记录下来，希望和有心的人一起分享。对于未来，我这里没有答案，只有思考，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一起思考，如果您有什么独特的想法，希望不吝相赐。

果真如此，本书就是成功的。

前 言

一、 期待 2015 年之后的凤凰涅槃

城镇化的话题，从 2013 年开始就进入热火朝天阶段，但在十年之前却并非如此，那时这是相当生僻的话题。十年前，当笔者进入国家发改委一家城镇化研究单位工作时，未料想到这个话题，现在会如此火爆。小城镇路线，才是当时中国政界、学界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导思潮。在 2005 年之后，城市群的思路，才逐渐被各界精英认同，逐渐成为主流。到今天，中央领导正式确认城镇化进程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抓手，这前后冰火两重天的感受，简直让人恍若隔世。

在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重要性之前，大家务必要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扎堆生活生产的形势，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化。从 1998 年到 2012 年，中国城镇化率从 28% 急剧膨胀到 51%，按一些分析人士的乐观看法，中国目前实际城镇化率已经高达 60%！如此多的人口，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中扎堆在城镇中生活，不仅在中国的历史上未

有，在全球其他国家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点，简单对比美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明白了：自1840年开始，美国城市发展，城市人口超过10%，到1970年，美国城市化率达到70%，基本完成城市化，用时超过120年。日本“一战”前的1908年，城市化率为18%，197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用时接近100年，其中“二战”后2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翻一番。和中国城镇化经历最为相似的，应该是韩国。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城市化快速发展始于1960年，当时城市化率仅为28%，1990年基本完成城市化，用时仅30~40年。但不要忘记，即使在2012年，韩国总人口也不过五千万人，而在城镇化起步阶段的1960年，才三千万，即使到1983年，韩国总人口也不过四千万。和中国13亿人口规模相比，只能算一个省。

中国人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各方目前对此有诸多评价和观点，其中尤其集中在城镇经济本身的集聚效应上。但人们之前忽视了城镇化的主体——人。是的，“人”的城镇化，才是这个过程的真正内容，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数据和现象。

数以亿计的农民、小城镇居民和他们的后裔，在如此短时间内扎堆城镇、大城市居住，其人口空间布局的骤然变化，必然引发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心理的巨大变化。传统农耕文明的“长老社会”治理模式和格局，已经完全不适应现有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变化。中国社会人群因为城镇化进程加速，其思潮目前已经出现明显的分层，难以在短期内看到相应的统一。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冲击，让旧有伦理体系与价值观逐步瓦解，整个中国社会出现

明显的集体心理不适。中国城镇社会，无论是在社会组织结构上，还是在文化心理上，都需要一次历史性重建，而这在短期内，也不见可供利用的现代思想资源。

城镇化与经济的关系，类似于鸡与蛋，很难确定具体的因果联系。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经济的周期波动，必然最终会体现在城镇化进程的具体表象上；一旦经济出现剧烈调整，中国城镇化社会是否对此做好应对措施，目前还是未知之数。

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体现在宏观经济上，尤其是近十年，主要表现为房地产行业的大爆炸，以及接近 10% 的实际通胀率，中国经济持续近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其规模和深度，在整个世界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如果将中国城镇化进程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其实始于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 1949 年以来传统计划经济的现代兵工厂模式，是转型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在 1998 之前的二十年，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破冰之旅，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逐步市场化的艰难行军。到了 2001 年之后，加入 WTO 之后，中国经济完全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全球产业链制造业终端全面搬迁到中国，成为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产业转移进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在互联网技术革命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引下，中国完成了与其产权制度完全不匹配的工业化进程，并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不仅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环境上的。

全球产业带来的技术扩散直接带来的是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随之而来的，就是人均实际收入增长。由于人口抚养比处于最优结构，社会储蓄率和投资增长都前所未有的高。这一切，都直接表现为持续十多年的房地产大牛市。

从直观现象上看，中国房地产大牛市，甚至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十多年高速增长的第一标志。中国城镇化加速，其实就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加速转移为城镇劳动力的直接表现，所谓“城镇化红利”，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红利”，确切地说是“农村人口红利”，这个过程不可能永久持续。大致在 2015 年，精确地说，就是在 2015 年，中国人口结构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农村青壮劳动力总量供给基本枯竭，而且整个社会人口抚养比开始不利于经济增长，中国老龄化社会开始来临。这一表现就是储蓄率和投资增速将会在短期内急剧降低，实际利率可能急剧上扬。

而在此之前，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都一起开闸放水，使用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一旦遭遇中国储蓄率降低，实际利率升高，那么意味着其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几乎没有了。因为中国人民一直以来的节衣缩食，向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出口物美价廉的商品，以及用购买美债等方式，才得以让全球各国央行的低息环境得以维持。这一结局，很可能在未来三五年内，演变成全球滞胀的格局。

对比美国的经济史就会发现，它的城镇化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和人均收入提升的推手。而这背后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技术革命，表现在时间周期上，就是持续 52 ~ 56 年的康德拉耶夫周期^①，这中间

^① 康德拉耶夫根据英、美、法等国一百多年来的批发物价指数、利率、对外贸易、能源的产量与消耗量的变动，提出有一种更长的周期，其平均长度为 50 年左右。这种 50 年左右的周期通常被叫做“康德拉耶夫”周期。

包括两个 26 ~ 28 年的库兹涅兹周期^①。我们目前难以清晰界定中国城镇化进程的确切周期时间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城镇化进程加速的直接技术原因，就是互联网技术革命，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其终止的迹象。但我们不可能想象它还会持续数十年，因为近十年经济发展积淀下来的诸多错误，需要一次经济衰退进行大扫除。而这次衰退的直接导火索，很可能是在 2015 年的中国房地产泡沫大崩盘。在那次崩盘之后，中国社会与经济有望进行一次大清洗，革故鼎新之后，进入下一个二十多年的城镇化加速周期。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需要一次涅槃，然后浴火重生。

二、驱动周期变化的力量

所有人都听说过经济周期，大多数中国人，只要是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即使是当年上课没认真听讲，也大致知道“这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后来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特色”越来越多，大家似乎也不大提及这茬了。既然市场配置所有经济资源，那么在论述这个问题之时，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美国

^① 库兹涅茨于 1930 年根据英、美、法、比利时等国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 60 种工农业主要产品价格的变动情况，提出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长度从 15 年到 25 年不等的长期波动过程形成平均长度为 20 年左右的“长期波动”。这一周期被称为“库兹涅茨”周期，由于该周期主要以建筑业的兴旺和衰落这一周期性波动现象为标志进行划分的，因而又称为“建筑周期”。

经济学家的名字——罗纳德·科斯^①。

科斯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自由市场那么好，为何会有企业这样的组织存在？按经济学理论，这是没道理的。因为市场价格引导一切，市场会合理安排资源配置，哪里需要企业组织呢？

答案在于，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雇主不可能每天在市场上和工人为薪水讨价还价，更不可能每天为厂房租金、资产设备买进卖出或者其他生产要素讨价还价，只能签订一个长期合约，将所有生产要素组织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企业的作用就是节省交易成本。那么，如果企业能节约交易成本，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工厂生产，那么全社会的生产要素资源可否全部囊括在一个组织里面，完全按计划有组织生产呢？同志们肯定马上想到了，这是计划经济。

但麻烦是，企业节省交易成本，也是有一个边际的，组织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内部组织协调也是要成本的，这个成本肯定比市场交易成本大。这个道理，只要是在大企业或者政府机构大组织工作过的人都明白：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泛滥，上下信息不对称，包括委托代理风险等，也就是经理人不拿股东利益当回事，毛病会越来越多，最后组织肯定运行不下去。所以，无限制囊括一切的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将社会经济资源捆绑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工厂。这看似节省了交易成本，甚至让交易成本为零，但只要是社会分工，本身是有成本的，不一定体现在市场交易上，

^① 科斯教授由于“发现并阐明了交易费用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杰出贡献，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

内部组织管理成本也是肯定存在的。这个组织成本达到一定量，整个经济就会瘫痪。

为什么有经济周期？

答案就不言自明了——因为存在交易成本。大家记住一点：这个世界，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国家”、“政府”、“公司”等有关组织的概念，落到实处，最终做出决定和判断以及行为的，还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是人，就会有局限性，就有七情六欲、会糊涂犯错，有时情感脆弱下迷惘、有时得意忘形，以至于无限膨胀等，因此他们在市场交易中相互谈判所形成的价格，有时并非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买卖的商品价格，很多就是商家“痛宰肉头的黑心价”，所谓“从北京到南京，买的从来没有卖的精”，就是这个道理。但大家还应该记住林肯的名言：“你可以在所有时刻欺骗有些人，也可以在有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的人。”错误的市场定价，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正常定价的，错误的定价肯定扭曲正常的资源配置，让资源流到不该流到的地方，最终肯定要出事。而经济系统出事的标志，就是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的形成动因，通常是系统基本要素长期定价失误的结果。这包括利率、汇率，以及煤电油气等基础产品价格长期被严重扭曲，更糟糕的是由于行政管制导致一些行业产品定价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日积月累之下，最后几乎无可救药，譬如教育、医疗乃至通讯电信等领域。就中国城镇化进程而言，其周期更迭导致的社会动荡，其背后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纳一下，也无外乎利率、人民币汇率，以及财政分税制。

长期金融管制与人民币汇率联系机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名义利率被长期严重扭曲，导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泡沫持续膨胀。而现有分税制财政体制错误分配公共资源，又再次加重了这个问题，让中国城镇化弊病积重难返。

这其中，有不可避免的部分，譬如信用系统自我膨胀过程：低息刺激楼价上涨，人们买涨不买跌，再次刺激房价上涨，房地产持续繁荣导致各行各业兴旺，收入提高再次刺激房价，如此循环不已，持续多年。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很难被打破，几乎是经济增长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有些，是错误政策导致的结果，譬如财政分税制。分税制导致中国财源基本集中于权力中心城市，而中国公共资源的分配，又和行政级别挂钩，这让中心一线城市过度集中公共资源，这又导致“大城市病”日益突出。一旦出现经济衰退，社会系统就会出现剧烈的动荡。

三、两大集体癫狂主宰中国经济未来

是人，就有局限性，成千上万有局限的个人凑在一起，他们的局限性就会放大，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一些事后看起来觉得荒谬的思想，却在当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城镇化，本质上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行为，一旦这些人集体犯错，那么肯定要出问题。

我们俗称的“泡沫”，在学术上定义就是“资源错配”，简单一句话，是经济资源被浪费了。经济，本质上是个人的决策，所谓宏观经济是由每个微观个体的人组成的。是人，都会犯错误，

一旦发现错误，尤其是让自己赔钱的错误，人们一般都会改正，表现在经济周期上，就是大家头脑发热，阶段性地搞出来的过度投资，然后经济崩盘，最后就是过于恐慌小心。

每一轮的经济衰退或者萧条，对应的都是经济体自我修复过程，这个过程不能舍弃，也无法规避，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经济的最大资源错配究竟在哪里呢？在笔者看来，实际上是在于人们最习以为常的两个现象中：联系汇率政策和计划生育政策。

何出此言？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于货币泛滥与投资过度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而这背后的根源，在于人民币汇率被持续低估数十年之久。而计生政策打破了正常的人口生育周期，导致社会储蓄率出现剧烈的波动，这将会在未来几年体现出来，可能从根本上困扰中国经济体自我修复的能力——除非世界经济又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技术革命。

先说第一点。人民币汇率问题，堪称是和“文化大革命”可相提并论的集体癫狂：如此违背基本常识的调调儿，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被如此多的人接受，简直不可思议。假如有人对你说，“哥们儿，我有1美元，想换你4元人民币，如何？”你不干。你说，“我得给你8元人民币！”对方也不干。说你抢劫他，你也怒了，痛骂对方包藏祸心……这不是说相声，这是持续数十年之久的中美两国的大事。再重申一遍：宏观经济不过是微观个人行为的累计，一个人发疯，无数人重复一个人发疯的行为，也是发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危害，在于你不是要给人家人民币吗？好吧，全球美元都跑到你这里，换走硬邦邦的商品，买你的工厂和土地，结果呢？我们手里攒着大把的美元借条，还有严重污染的

空气、水流和土壤，以及在其中轰隆作响的加工厂……

因为持续泛滥的美元流入，兑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泛滥，推高房价、地价以及一切能涨的价格。

在2013年，中国认识到其中的谬误，人民币汇率升值趋势气势如虹。但不管人民币汇率是否真的与美元脱钩，大错已经铸成，持续数十年的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导致的经济系统资源错配，现在已经显现：出口经济畸形增长，国内污染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包括房地产泡沫在内的通胀噩梦，始终挥之不去。如果中国人口结构是健康合理的，那么这些问题，在下一轮经济调整中可以得到纠正，但麻烦的是中国人口结构被计生政策严重扭曲了。

据一些体制外人口学家估算，三十年来，仅是计生部门强制人流的婴儿就是2亿多。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老同志们拿的养老金非常丰厚，甚至比年轻人工资还多，但那是我们现在青壮年劳动人口上缴的社保资金奉养所致，社保专家估算，整个中国养老金缺口在三万亿左右——也有说十几万亿的，反正缺口的单位规模是万亿，不出五年，这社保养老金的缺口问题就会凸显。近期先是官方表态要延长退休年龄，后来不断有专家倡导，老同志可以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等。^①

糟糕的不仅是这些，最糟糕的是，人们之前预期政府能养老，上缴的社保基金是保障未来所需，是用于投资的，但实际上它们被消费掉了。这后果非常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人们预期社保

^① 清华教授谈延迟领取退休金：男的去当园丁 [EB/OL] [2013-09-12] <http://ndfinance.oeeee.com/html/201309/12/243844.html>.

基金没被浪费掉，所以自发提高消费，如果没有社保，他们可以挣10元，花5元存5元，现在有社保，人们会花8元，只存2元。上缴社保的中国人，至少也有3亿多人，这些人们的储蓄消费行为一旦被错误引导而扭曲，那么未来的实际利率可能是“坐火箭”。一个社会系统的经济行为无外乎三种：生产、储蓄和消费。由于相信政府能养老，所以大家就降低储蓄，到后来，由于劳动力逐步减少，干活的人也越来越少，同时消费的人却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经济前景黯淡是可以想象的。

十几亿的人口，数十年来，就这么轻易迷信美元是硬通货，任何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都被媒体舆论攻击为汉奸卖国贼，对这些调调儿，大家都习以为常。这种集体癫狂，真是千年未有之怪现象，非但中国五千年历史以来罕见，在全球历史上也罕见。而这些集体癫狂，在未来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现在似乎还不得而知，这才是真正让人恐怖的地方。